

东海岛屿

文化与民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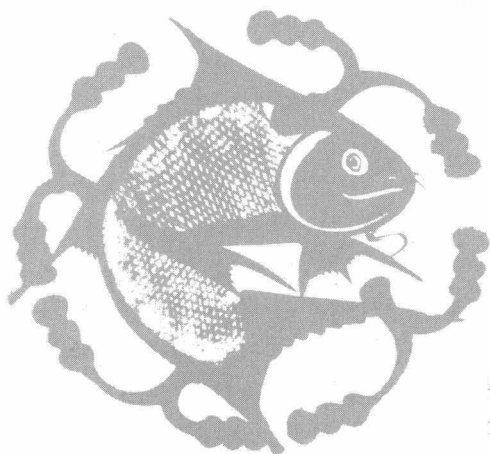


姜金 彬 主编
(特邀) 副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东海岛屿

文化与民俗



姜 彬 主编
金 涛 (特邀) 副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K892.45
80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姜彬主编. 金涛(特约)副主编.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6

ISBN 7-5321-2799-0

I. 东… II. ①姜…②金… III. 风俗习惯-研究-华东地区
IV. K8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893 号

责任编辑: 赵南荣

封面设计: 王志伟

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

姜彬主编 金涛(特约)副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38 插页 2 字数 605,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2799-0/K·203 定价: 6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本书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撰 稿 人:

序论、后记

第一至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姜 彬

金 涛

莫 高

蒯大申

序 论

吴越地区(亦称江南地区)以水乡著称于世,但从地理结构来说,它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是多种形态的组合,不是单一的构造。就大的来说,这个地区比较明显地可分成三种区域性类别:一、广大的有水乡特点的平原水稻地区;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有许多港口和孤悬海中的为数众多的海岛;三、有林木幽深、连绵不绝的富含特殊文化内涵的南方山区。这三种区域,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别和历史演进的不同而形成的生产样式、劳动种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不尽相同,甚至有重大的区别。即使在社会形态相同的条件下,它在文化创造上也各具特色。我们这个课题就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挖掘和考察三个不同区域中存在的不同文化形态,它的重点是民俗文化。我们企图把对这三个不同区域的考察组成一个系列研究,通过对三个区域具体文化形态的发掘和考察,提供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概貌,让人们(包括我们)在进一步探索这个地区民间文化的理论体系时,有个比较全面的、真实的、活生生的材料依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研究还是着重在具体事象的收集,换句话说,是实证多于理论的。我们意识到,任何一门学问,这是必经之路。

这个系列研究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出版了《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和《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二书。我们的第二步,就是本课题《东海港岛文化与东亚》,分成两本书,即《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和《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将于近期先后出版。最后一部分是《吴越山区文化与民俗》,这三部完成后,如果有力量,准备在这基础上,做些上升为理论的研究。

究。当然这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力所不逮,我相信也会有有志于此的人来完成。

本课题对我们来说颇具挑战性,不是沿着前两本书的路子就可以的。海岛是个很独特的地区,它长期孤悬海外,远离大陆,在人们的想象中,很有几分神秘的色彩,让人感到新奇,产生悬念。撇开古代人对海岛种种瑰丽的、充满幻想的神话传说不讲,就从现代而言,诸如人类是怎样踏上它的土地,它又是怎样得到开发和发展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的命运是怎样的,它是怎样经过艰难困苦、曲曲折折走到今天的,人在这样独特的境遇里是怎样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文化等等,这些问题对我们不仅有新奇感,而且颇具魅力和产生探索的愿望。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几乎是一些全新的领域,它涉及的问题非常广,大大超过民俗文化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不是一般民俗学所能包容。当然,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这座山很大,蕴藏千千万万的金矿,我们只开采其中的一个矿区,让其他矿区留给各个方面的探矿者去开发。但是,一个麻雀,它的五脏六腑也是全的,取其肉者,必然会观照它的全身。民俗只是人类文化中活的一个方面,但它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不可分,研究民俗必然会涉及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与它紧密相连的部分,如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这涉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不能孤立地去了解和研究一种现象,或者不能就事论事的来看待一件事。要把问题当成一个总体来研究,只有从总体观照,才能说明局部。现代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说:“一个特殊社区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系密切地相互关联着,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或体系中的各部分。任何一方面,除非研究它和其他一切别的方面的联系,不易正当地说明。”^①这个在对落后民族对比研究中逐渐明确起来的命题,现在差不多已被大多数文化人类学者所认同。布朗的方法论归根结蒂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但万物是相互联系着的,要正确地认清一件事或一个方面,必须与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研究,否则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这观点无疑是有价值的。认识和研究民俗事象,也是如此,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

^① 《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2002年1版,第181页。

文化的全部,而且它与社会的其他现象密切地联系着,不能孤立地来认识和研究民俗。因为我们并不是就事论事地了解民俗现象,而是要从民俗现象进而认清民俗的性质,这一点在民俗本身中是达不到目的的,必须要弄清这项民俗现象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发展和变异的,也就是说要追寻民俗的根源。根据这个认识,本书的章节安排,似乎超越了民俗学的范围。但本书仍然是一部民俗学的著作,不仅民俗的叙述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而且与民俗现象没有直接联系的章节,也是与民俗密不可分的。这些章节有“岛屿居民的渊源与变迁”,安排这一章的原因在于民俗是人类社会中产生的,不弄清人的来龙去脉,也就难以明白民俗产生之由;“东海第一大渔场的开发”一章,捕捞生产和渔港的建设是海岛居民经济生活的中心,民俗的发生与经济活动分不开,这是不说自明的,它比居民的来源更切近于民俗的决定性因素。书中还安排了一章“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这一章看来与岛上民俗的发生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对今后岛上民俗的演变,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不仅体现海岛在自然生态上蕴含着某个方面的潜力,而且显示出了海岛在发挥自身优势的一个经济上的新动向,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因此,对海岛居民今后民俗的变迁会起到不可避免的作用。这几章我们放在以民俗为主体的书上,并作为书中有机构成的章节,大体上有这么两种意思:一是作为海岛民俗的背景材料,提供对理解海岛民俗的某些参照数;二是这些问题本身也充盈着不少文化的含量,它与民俗是相通的。民俗是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一部分,民俗文化学,这是中国学术界在民俗学上充满创意的一种见解,一种新的学说;它对民俗学是一个填补,一种高扬。关于民俗文化学,我在下面还要谈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这部关于民俗学的著作中,我们安排这几章在传统上与民俗有些距离的章节,只是一个尝试,不是也无意对海岛文化作全面的探索。海岛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海洋文化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海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一直被人视为国家不沉的航空母舰,经济上它是人类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富藏。国内外都有人提出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是人类社会开发海洋向海洋进军的世纪,海洋里不仅有无尽无穷的鱼产资源,

而且在海床上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等着人类去开发和享用。在开发海洋的事业中,海岛当然大有用武之地。海洋开发不但要集中大量的人力,还必须运用高新技术,所以,海岛必将成为人类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基地之一。当然,这是后话,在海岛的发展中,对海岛居民民俗的影响必定是巨大的,这里我们就无从推察了。

关于本课题的筹划原则、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基本上与前两个课题是一致的,但由于涉及的内容不同和地域差异,根据民俗学在研究上的一个绝对要求,它的材料必须是从现实中调查得来(在这一点上它和文化人类学的要求是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是资料的惟一来源,在研究过程中,它并不拒绝文献资料以及考古挖掘资料的运用,这是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它使民俗学上升为一门历史科学。但从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对象来说,从现实对象进行调查,获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十分重要的,甚至被认为成果是否有较大价值的一个标准。根据这个要求,前两个课题我们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是大量的,至今还认为这样做极其必要。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无一例外地都提出了这个要求,现今世界上这些学科在调查上大致存在两种方式(具体做法各有不同):即投入式的调查和参与式的调查,前者是作为一个外来者沉入到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中进行调查,后者则更进一步直接参加当地的工作,作为事件的一分子,而不是旁观者。当然后者更具有实践性,调查材料也会更加接近事物深度和真实性。但综观现代世界上的调查现状,进行参与式调查的时间都不可能是很长的,因此,这引起了有的研究者不无道理的疑问。从历史上看,这样的调查虽然是富有成效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它是了解和认识事物的有效途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中的许多经典著作就是在实地调查后写出来的。现今有的研究者提出这样的疑问,他们认为即使你较长地作了参与性的调查,是不是可以说你所得到的他们的想法,与那个地区、那个民族的深层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内心世界,外来的人要真正了解是困难的。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对调查的要求过高,或者甚至是对调查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我们且不管它。从这里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就是除了民俗学现有的调查方式外,还会有

更理想的另一种调查方式吗？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使我体会到，在个别的情况下，也可以探索另一种调查方式，即作者本身就是这个地区、这个民族中土生土长的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同本地区、本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他和他们共同经历了生活的欢乐和苦难，完全体会得到人们心灵的跃动，摸得着他们对问题的思路；由这样的人对民俗进行调查和描述，把这种要求作为调查的一种方式，当然是最理想不过了。但作为方法，我们必须作必要的限定，不能把它当作普遍的要求，否则会得出调查只能由本地区、本民族的人进行的狭隘观念，会拒绝对先进文化的借鉴和主导作用。我是说，如果有这个条件，恰恰碰到物色到这么一个人才，那是最理想的。作为提倡当然也可以着力来培养和物色这种人，但这不是短时间能奏效的，本课题凑巧有这个荣幸，物色到这么一个人，那就是本课题的主要撰稿人——金涛。金涛出生在舟山群岛的嵎泗列岛的黄龙岛上，这是个小岛，但在渔业上，它是一个重要的渔产区，以盛产开洋出名，岛上渔俗丰富，一年四季有很多祭祀活动。旧时生产方式落后，无边无涯的大海捉摸不定，渔民常常葬身大海，大多数的情况下连尸骨也捞不回来，在这种惨剧中，渔民只有向冥冥之中的神灵求救，岛上有祭潮魂之举，用稻草扎成草人代替真人下葬，在潮魂之夜，岛上一片凄惨哭泣之声。金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他的中学是在县城（嵎泗列岛菜园镇）上的。嵎泗列岛由一系列小岛组合而成，其中有不少重要的渔场和渔港，是舟山群岛中渔业生产集中之地，可以说，在舟山地区，嵎泗是个主要的渔业捕捞作业区。岛上居民多数是渔民，不少岛是纯渔区，所以，不仅渔俗丰富，而且比较典型。中学毕业后，他去省城求学，后又回到家乡，走上了文化工作岗位（县文化馆搞创作），长期从事岛民文化调查和学术研究活动。在这一时期中，他和大陆的联系主要是开会、学习和访问考察活动，极大部分时间是在岛上度过的。他对岛民生活的熟悉和对海洋文化的研究，特别对海岛民俗的了解，是既深又透的。由于他对岛民文化的研究深入精粹，不少学术成果被国内外学术界所赞许，因而获得了国家所认可的高级馆员（相当于教授和研究员）的职称。这在他是来之不易的，一个孤悬海外的八万余人的小

县,出了一个有高级职称资格的研究人才,不能不认为是凤毛麟角的奇事,而且他的成功并不是在外培养而成,而是土生土长出来的。当然,对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不是只要生活在其中就可以获得的,还需要他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对实地调查来说,还要有较开阔的视野,对一地民俗深入研究,需要更大的地域民俗知识作为参照数和比较,否则很难挖掘文化的底蕴。数十年中,金涛在这方面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和探索,利用开会、出差、调查研究和陪同外国学者进行访问活动等机会,考察过舟山大小岛屿、山东沿海渔村、上海崇明岛、象山石浦港和浙南洞头、玉环诸岛,足迹遍及东南沿海,发表过不少调查报告和学术著作。所以,对本课题的撰写,他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但这不是说,他的写作很轻松、每一章的撰写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重新的调查和研究过程:每一章的写作都有一个艰巨的历程。

我这里是就民俗调查的第三种方式来谈到金涛的,其实,我们在已经进行的几个课题的组织、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深切地感到,在吴越地区,不论在平原、在山区或在海域岛屿中,这样有文化有实践经验的文化工作者为数是不少的,金涛只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在《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一书中已经说过,这里有大批在解放初期就从高等学校出来,分配在县、区文化部门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他们既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又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和群众联系密切,熟悉民间生活,只要有人加以组织,在学术上加以引导,给他们发挥才干的机会,他们都可能在参加民间文化的调查、研究和撰写的行列中发挥作用。他们和当地群众比较熟悉,调查起来比外来的人方便得多,这是我国民俗学的广大后备军。

金涛在这个课题上所起的作用,又一次证实了我们这个路子走得对。这个课题中,他一人承担了八章的撰写,全书十章,他完成了三分之二。从熟悉程度来说,有些问题几乎非他莫属。他亦深知自己的优势,在课题组织之初,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课题章节最初确定之后,他就当仁不让地报出了愿意承担撰写的章节,其义无反顾的坚决劲儿,使人相信再也不用作别的选择了。现在,课题的稿子已全部集中,付梓有日。综观全

稿,他果然不负众望,他所完成的章节,理所当然地成为本书的主干。我们这个系列研究,到这里可以说又上了一个台阶,无论从资料挖掘的丰实和深入,还是在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完善上,对前两个课题都有新的突破,这在金涛所完成的几章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概括地说来,至少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加强了历史分析。民俗学原本是一门现代性比较强的学科,前面已经说过,它所着重的是从现实中作调查研究,对现实中的事象作细致的实录,从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当然仍然是民俗学的当行本色,但我们想,任何学科都需要作各方面的探索,在这个课题上不满足于对民俗现象的描述,试图加强对民俗现象的历史思考,弄清民俗现象的来龙去脉,以达到探索它所以产生之源,对某些在民间有重大影响的民俗事象,作了深入剖析,以达到弄清民俗的本质和特色,以加强对民俗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意义。

二、深挖地域民俗的特色。不同地区,特别是生活环境和生产样式不同的地区,民俗的地域特色就越明显。当然,在生产基础相同的地区之间,虽然民俗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研究地区民俗,关键在于阐明本地区的民俗特色。本书中金涛执笔的诸章节所显示的民俗学研究,根本特点在于着力挖掘地区的民俗特点,正由于这一点,使本书成为一本不可重复的民俗学著作。这好像舟山群岛这样的特殊区域,尤为重要。舟山群岛系浙东近海岛屿,居民虽起源很早,但历史上经历过明、清两代多次的“海禁”,居民搬迁一空,岛上原有的居民早就消失;现在岛上的居民大多是后来从宁波、温州、台州、闽南等地区搬迁过来的,因此岛上居民的习俗和大陆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但许多岛民都是在其祖辈就迁居过来了,时间长的已过了百年,短的也有几十年,由于生活环境和劳动环境与大陆迥异,早已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岛屿民俗。即使是大陆带来的风俗习惯,也已新的境遇里产生出新的因素,有着自己的色彩。所以,要了解和认识海岛岛民的民俗,必须要挖掘岛民的民俗特色。

三、资料搜集不仅注意了“深”,也注意到了“全面”。海岛是一个社

会,海岛居民的生活内容不是单一的,在生产方面,除了捕捞活动外,还有工具制作(造船、织网)、渔场、渔港的配套设备、农垦、纺织等等,其他如贸易活动、社会组织,无不齐全。这些不同的生产样式和其他社会性的行业,对岛民的民俗都发生交互作用,有些活动本身就存在着民俗事象,研究岛民民俗需要统观全面,又要突破重点,轻重结合,既深且广。

在本系列研究进行之中,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不少新的现象,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提出,钟敬文先生在其耄耋之年,以从事中国民俗学研究数十年的丰富学术经历,首创了这件事,这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道路上无疑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从“五四”时期的《歌谣周刊》的出版算起,中国民俗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由于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同外国帝国主义、国内反动势力进行誓死搏斗,经过千辛万苦的斗争才取得了胜利。中国民俗学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也经历了一条时有时无、忽断忽续的过程。虽然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学者在坚持从事这项工作,但它必然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不得不与时沉浮,在那个时代它只是时代的夹缝中乘隙生长的一丛小草,难以成为随雨露而长的大树。全国解放后,首先得到发展的是与革命形势相适应的人民创作——民间文学,而整个民俗学还提不到日程上来,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新时期,民俗学才得到了发展的空间,出现了大展宏图的前景。不管怎样,中国民俗学从它的肇始至今已有八十年的漫长历程,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料和经验,有了适宜的政治气候和学术氛围,它自然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钟敬文先生凭着他对民俗学的执着追求之情和丰富经验,登高一呼,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之说,提出“学术从整体上向更高的层次迈进”。钟先生对中国民俗学派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有一整套设想,建立了自己的一个系统,这对中国的民俗学发展会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些设想还属于中国民俗学派的初创阶段,还不能说中国民俗学派的将来就是这个样子,世界是瞬息万变的,学术是不断发展的,前人总结的经验还要经后人的努力实践来加以完善和发展;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它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但不管怎么说,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提

出,必将会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钟先生的体系中对民俗学的定位问题,作过系统的论述,这个问题是一百多年来各国民俗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至今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论断(也许永远也不需要这种论断)。各国各有各的说法和实践,英国早期民俗学把民俗局限在“古人的心理表现”,也就是说民俗是一种“精神现象”。英国民俗学者的一个著名的说法是:“引起民俗学者注意的是,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鱼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①后来,各国民俗学把范围逐步扩大,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民俗学者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民俗学不仅研究精神文化,也研究物质文化,比如日本从《乡土研究》时期(1907—1924年)就注意到了山村生产、狩猎生活变迁和狩猎方法,1921年就由涩泽敬三创造了民具博物馆。在30年代出版的《山村生活研究》、《渔村生活研究》等,也注重了生产和民俗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生产方面,关于工具的制作、使用方法等技术研究,特别是石工、木工、捕鱼、狩猎、金属制造等工匠的工具与技术系统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冲破了博尔尼所界定的民俗学研究领域。^②

中国的民俗学则走着自己的路。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充满艰难、曲折和动荡,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之路也极其曲折而缓慢,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前后开始,一直要到八九十年代才显现出自己的个性和体系。这漫漫的八十年长途,它的盛衰、发展和成熟,无不刻画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印记。它是从荆棘丛生的路上走过来的,而今当它像火中新生的凤凰一样展翅高飞的时候,身后还不免带着历史烟尘。中国民俗学的再度兴盛和成熟期出现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民俗文化学的提出,比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要早一些,撇开历史渊源不说,1989年钟敬文先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中就作为篇名提出了,到1996年才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民俗

① 【英】查·索·博尔尼:《民俗学手册》。

② 参见张紫晨为英博尔尼的《民俗学手册》中译本所作的序。在欧洲许多国家,也出现了搜集家用器皿、工具、农具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热潮,认为这些对于阐明传统习俗有着重大价值。

文化学”,从此,民俗文化学就作为一种学科正式面世。此议一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也就水到渠成,1999年《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便与读者见面了。中国民俗学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预示着一一种远大前程。

民俗文化学显示了中国民俗学派的特色,与世界各国民俗学都是不相同的,有了它,中国民俗学才显出与众不同的个性。虽然有些内容有的国家的民俗学家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还没有像民俗文化学这样进行系统和完整的概述,它的可贵之处是具有一种对学科的自觉性。当然,我不是说它已经很完美,但至少在现阶段它可以成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的一种标志。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还有赖于后代的创造和发展,但民俗文化学的创立功不可没,它给新中国的民俗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石。

把民俗作为文化来研究,这对现代民俗学的范围是一个历史性的扩展,是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特色。民俗文化学的内容和范围,照钟先生的设想,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①。它的覆盖面很广,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文化学也可以叫做“民间文化学”。

民俗文化学是把民俗学与文化学结合而成的一个新学科,或者说是民俗学在中国土地上产生的一种新形态,它的主干还是民俗学。民俗文化学的含义,根据我的体会,至少包含着下列两个方面:一方面把民俗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另一方面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进行民俗现象的研究。前者扩展了民俗学的范围,后者是一种研究方法,带有方法论的意义。

民俗文化学在我国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历史渊源和现实根据。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极大部分是中下层民众,他们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化,中国的所谓“俗文化”,往往就是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俗文化也就是民俗文化。其次,中国是一个历史极其久远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古文化的国家,文化中有许多现象都有古代的轨迹可寻,这很自然就产生探求事物的文化发展历史及其意义,从而使我国的民俗学有了

^① 参阅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一书。

一种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质。

现在,民俗文化学的观点已为我国民俗学界的不少学者所认同,正在我国民俗学的研究中发挥着作用。我们这个系列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的,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受到这个学术思潮的影响,从广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这个学派的一个不大高明的例证吧!

在现代的学术思潮中,还有一个与本课题关系比较大的思想倾向,要简略地说一下。在给民俗学定位中有一个问题是:民俗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国内外都有一些说法,有的把民俗学看作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把民俗学的范围限制在狭小的民间创作上,把其中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重叠比较多的风尚习俗、民间信仰、社会组织等等划出来作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专利,而民俗学则不必去问津。欧美的有些学者,包括前苏联的学术界都有这种主张。当然,这作为民俗学中的一个学派是可以的,但从民俗学的历史和整个学说含义来考察,却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1846年民俗学这个学科在英国提出后,很快就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1878年英国建立民俗学会后,欧洲及北美不少地方的民俗学团体也都相继问世了,亚洲的日本、中国也都在20世纪初出现了民俗学运动,出版了有关书籍和刊物。民俗学这个词在英国出现,甚至比文化这个词要早二十年。^①所以,民俗学不可能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部分,只能说文化人类学调查和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民俗的内容,但它不可能代替民俗学的研究。文化人类学从历史上说,是资本主义处在殖民时代的一个新兴学科;从学科的前期准备来说,它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学科,起源于殖民地开拓时期对后进民族的调查。而民俗学的前期准备却要早得多,人类自从有了社会生活,就有民俗现象出现,有了文字之后就有这方面的记录。欧洲的民俗学家把它推前到文艺复兴时代,甚至古希腊时代;中国的民俗学家根据大量的古籍记载,指出它们早在周代、特别在春秋战国时代即有关于民俗的丰富材料,随着越来越多地下发掘出的文物,更证明了民俗学的前期准备材料早在史前时

^① 参见《民俗学讲演集》第474、516页。

期就存在了,从而使考古民俗学成为现代民俗学的一个重要支流。

从内容和方法上说,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确是最为亲近的两个学科。民俗学作为一门文化领域的学科,有许多内容是和文化人类学重叠、交叉的,文化人类学如果不关注这一部分内容,那作为一门文化学科就会是不完整的,两个学科之间有的很难割断,甚至是相互通用的。但这并不影响两个学科中各有独立的一面,更不影响二者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何况共同联系的部分,也存在着各自的视野和侧面,使它们互相区别开来。

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还有一个极其相近的方面,就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都是民族的民间生活现象,研究材料来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所以,它们有个共同的着眼点,就是向现实作调查,只不过文化人类学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殖民地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异民族,而民俗学在多数情况下是调查国内的乡村民众,但向现实生活调查材料的要求则是两个学科共同具有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两个学科也有相同的侧重点,就是强调比较研究,当然二者的要求和方法的使用是有区别的。比较研究法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是个基本方法,它最早产生于对殖民地落后民族的调查材料与本民族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该民族所处的历史状态,比较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来说是一个绝对的要求,有的甚至认为比较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惟一方法。民俗学也把比较研究看成是一个重要方法,经常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相同的民俗现象作比较,特别在民间创作上把搜集到的各地区、各国同类的故事、歌谣进行比较,从它们的异同中来得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作品特质,探索它们起源于何地 and 流传路线,从这种比较中形成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所谓“类型研究法”,风行于全世界。这种方法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是有效的,但从深层上来要求,这种研究常常容易坠入形式,不能探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以一些有经验的民俗研究者早就悟到不能把比较研究绝对化,日本著名学者关敬吾就指出“比较研究不是惟一的方法”,钟敬文先生用另一种说法讲出了同样的意思,他说:“……用得好的话,比较方法不失为一种方法”,对比较研究法给予了一定的保留态度。

方法论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钟先生从中国的

现实和新的民俗学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中国民俗学派的方法要求。他所提出的新方法不一定完善,但我以为总的框架还是很有新意的,特别是他提出在民俗研究上,不仅需要有具体的、专业的方法,还需要有总体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他在自己几十年研究生涯中体会到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不仅是一种总的观点,也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当很少有研究者在民俗学研究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放在脑子里的时候,他提出并坚持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认识现实的科学体系,它吸取了人类知识宝库中最高的成果,加以改造并构建起一个科学体系,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当今西方民俗学的各种流派,都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其中也不乏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大多是些具体的、局部的方法,缺乏理论体系和哲学思考,对它们可以借鉴和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使用,但不能照样画葫芦,全盘吸收,甚至作为新鲜的东西加以宣扬。

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实证见长的学科。正是它在学术上的这个特性,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视,特别对它早期的一些学术意味比较重的经典著作,被马克思倍加关注,因为它对缺乏文献材料的古代社会,从社会发展的阶梯上作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再现了古代社会的形态,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描述,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供了事实根据。马克思曾经对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的著作作了详细的笔记,特别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被恩格斯看作是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这部文化人类学著作的评价之高了。^① 马克思对该书曾作过长篇的摘记,打算用自己的理论阐释这个著作的重大意义;但马克思生前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他去世后,恩格斯秉承了战友的意愿,根据摩尔根的著作(补充了许多他自己积累的材料)写出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经典著作。马克思还对其他几个文化人类

^①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现代有的人类学者根据片面的、个别的事实,企图贬低他,但这是徒劳的。